

天地之中,有嵩山焉。嵩山挺立大地中,巍峨耸立,上摩天际,成为中原地区的自然地标与文化景仰物,所谓“高山仰止”是也。因而,与鲁南人对泰山的深厚情感一样,大约中原人提起嵩山,没有不向往之情油然而生的。

由于鼎峙中原,嵩山自古以来被赋予了特殊的观念内涵。所谓中原,系炎黄部族最初筚路蓝缕的祖居地和由来之地,她孕育了华夏部族的根脉,发源了中华民族沛沛的历史文化长河。嵩山则为中原之天柱,又称嵩岳,《诗经·大雅·嵩高》所谓“嵩高惟岳,峻极于天”,她因而荣膺“中岳”称号,遂居中国“五岳”名山之首,为历朝历代君臣民臣所尊崇。于是乎,在国人“中岳——中原——中州——中土——中国——中华”的观念链中,嵩山成为“天地之心”之象征,民族表记之寄托,她作为古人宇宙概念的外化物象,聚合成中国人尤其是中原人的原始心结。

我与嵩山的情感牵惹,始于幼时的登岳。我从小认识的山就是嵩山。郑州旁侧无大山,黄河南岸的邙山,尽管由于刘邦项羽楚汉争霸、在这里发动的鸿沟大战而颇负

历史盛名,毕竟只是一条丘陵土包,远远当不起“山”的称谓。再远的就是嵩山了。记得少时乘车前去游访,视界里于青葱原野间忽然拔地而起一座混莽苍峻、雄浑陡峭、目极不能尽、飞鸟不能升的高山,不禁凛然惊惕、肃然起敬、神魂精魄俱为之摄!车止登上县城,然后攀爬太室山峻极峰,深入白云间而返,下眺山脚古城堡如棋盘,留下终生印象。后父亲因乡谊研究唐代诗人文参行迹,终日考究其中的太室山、少室山,启母阙地理方位和人文内蕴,使我多了一些对嵩山的质感。长而踏访中原古迹,多绕嵩山回环。先于其北麓瞻观偃师酒流沟宋壁画墓、巩县宋陵石翁仲列、密县打虎亭汉壁画墓,仰面见嵩阴山形。后绕至南麓深入其腹地,多次踏勘中

岳庙祭天露台、嵩阳书院大将军汉柏、少林寺塔林与达摩洞、郭守敬观星台,始知嵩山与中原文化渊源深厚。

我河南大学中文系77级的同学张国臣为登封县人,少时即与嵩山之体相摩相接、相生相感,以后长期工作在中原地区,来往驰骋,时或回乡,出入嵩山腹地,更为其精气氤氲激荡。又好古喜文,四处游历必有诗咏文颂,因而深究嵩山自然地理、文脉情思,成地域散文30篇,约为一集,命余作序。我因一己之嵩山情结,又以同窗谊,因稍为之凝思殚虑,欣然命笔耳。

初睹国臣散文,入眼尽是自然意象:山麓红叶、涧底流泉、林隙风形、柏间塔影、书院晨雾、佛寺晚钟,举凡嵩山晦神态、四季风景,处处可品,事事入诵。国臣在用他一颗

体贴的心感受着嵩山的温情,把发现的目光印满了她的每一个皱褶。然而国臣的辞情又不止于山川风物,更深入到其历史文化的厚重肌理,因视而见史,以事而出识,于是论随景出,逞文命意,笔墨踪及禅宗、道教、儒学、天文、地理、建筑、武术、医药、经济,地覆海涵,颇多哲意,把文章做成了学问。虽然理胜于情,未全合我口味,然系统梳理嵩山人文历史,弘扬特殊地域文化,亦成为触摸中原文化原旨的一次有益尝试。尤为吸引也感动我的,是国臣行文的敦朴浑厚风格,以及文中原始一以贯之的昂扬向上之气,它氤氲在这篇文章辞里,也如影随形地缠绕在国臣的人生路途之中。我由是看到了一个嵩山之子从坎坷山径上一路走来,艰苦跋涉,披荆斩棘、风尘仆仆,毫无懈怠,终于徒步而至千里,聚细沙而成坚塔,成就了今天可赞的事业。古话曰,文如其人,其国臣之谓乎?

打开这本书,慢慢地读,细细地品,听张国臣说嵩山的博学、聪慧而又朴实无华的话语,于是我们就随作者一起行走于崇山峻岭之上、探幽于峡谷深壑之间、沉醉于文化渊薮之中,能不美景与遐思与共、感悟与感动共生,其乐融融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以及跨文化交际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学者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在内核部分的区别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有的学者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力图促进中外文化尤其是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诚然这些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遗憾的是,可能由于文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尤其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一般的中国文化的学问家以毕生的努力也未必能够摸到门径,加之,要与同样源远流长以及具有同样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并得出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些学者本身的见识和学养的不足也导致他们得出了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所谓结论。这些对文化问题的偏见,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将有损于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

笔者注意到一些学者在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得出了中国文化属于阴柔型而美国文化属于阳刚型的学术结论,基于这样的学术结论进而认为中美文化可以互补。窃以为这样的学术观点很值得商榷。理由是,这样的学术结论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中国文化不是阴柔型的文化,虽然中国文化强调温柔敦厚,但中国文化也推崇阳刚,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诚然,中国文化不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在整个流变过程中,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中国文化的确是三足鼎立的文化。然而,就中国文化历史的情形来看,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切实地从人出发,从每一个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儒家文化之所以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纲常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照顾到了各种身份地位和文化层次的人的实际情况,三纲五常强调人伦关系互动,强调人的德性,不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德性面前人人平等,国君也有德、无德的君主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暴君、昏君,会受到批判和挞伐。儒家文化以理智的眼光看待人伦关系,是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文化。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说,如果君主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可以让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品。可惜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文化背负了太多的历史负担,满清结束以后,儒家文化被迅速妖魔化,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将本来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儒家文化推到了先进文化的反面,受到整个民族的口诛笔伐,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儒家文化更是属于被扫除的牛鬼蛇神。

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倒的确提倡阴柔,老子认为,无为,不敢为天下先,是他立身处世的一大法宝。庄子提倡逍遙游,承接老子的衣钵,与世无争。老庄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大,后来发展为道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佛教文化也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佛教提倡忍辱、持戒和精进,对部分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在一定时段上对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即君主的影响也很大。佛道两家虽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用很大,但比较而言,还是儒家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明显,所以儒家文化一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自己是一位极其仁慈的大圣人,他提倡不反抗,非暴力,不合作,他说过,别人要打你左脸,你将右脸也奉上去。基督教奉行的不抗恶,不给敌人以消灭自己的借口这种策略的确了不起。但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比较,就少了一些阳刚之气,儒家文化提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倡士可杀不可辱,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激励出了一代代的仁人志士,他们不畏强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人不要骨头,不怕死,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然,中国文化本身是刚柔相济的文化,儒家文化提倡“外圆内方”,在“仁义礼智信”五种品性之外还加上“温良恭俭让”这五种品性,可见中国文化在造就人培养人方面思考之周到。中国人常常有温良谦让的外表,但他的内心十分刚强,“仁者无忧”,“勇者无惧”,“智者不惑”,中国人中有太多的“大智大勇”的人,可是你要观察他的外表,却是如此的“温良恭俭让”。

洞察

当下文学批评的估价、处境与缺失

□王卫平

怎样估价当下的文学批评

似乎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抱怨当下的文学批评,不乏危机、困境、失范、失信、失效、主体贫乏、软弱无力、滞后于创作、找不到出路等语。我认为,这些估价带有偏颇,文学批评没有那么糟,其主体、主流绝对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问题的出现,不一定是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比如,批评的边缘化问题、批评的乏力和影响力萎缩问题、批评的生态环境欠佳问题等就不光是批评家的责任。试问,创作不也在边缘化吗?理论不也表现出乏力和影响力萎缩吗?它们的生态环境也不比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好到哪里去。当然,这不是为批评家开脱,也不是说批评家不要积极应对、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但像20世纪80年代创作与批评的“蜜月期”已经很难重现了,在我看来,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也许更是一种常态。

有人说,今天是一个文学批评缺席或不在场的时代,这些话语虽有警示作用,但总有些言过其实。我们看到,批评家们在各地的各种媒体上不断地发表着不同的声音,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批评并没有缺席,而是始终在现场。每年的各门类创作状况都有权威批评家的述评,一些重要作品的问世也都有关研讨,遇到重要的评奖,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的获奖作品也都有专门的评论文章,都有人专门研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都有批评者关注,一些新的文学现象比如网络文学等,也都有批评家跟踪研究。我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寻找出路或突围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和发展方向的问题。我倾向于向着贴近作品、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读者、贴近文学价值的探寻等方向发展。

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当今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队伍相当庞大。这支队伍在总体上是好的,是有良知、正义、责任和使命的,也是有知识、学问、修养和文学感悟能力的。

我们再追究一下:是谁在低估和抱怨文学批评?是批评家自身。这固然反映了批评家反思和自省的力度,但也说明,当今批评已进入到自说自话的时代,除了批评界以外关注的人并不多。

文学批评面临怎样的处境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文学批评,而社会的弊端、不良的风气,则肯定会影响批评作用的正常发挥。在实用化、商业化时代,在追求物质利益、经济实惠最大化时代,文学批评难免边缘化的处境,因为它是精神的事业。而读图的时代多以快乐为原则,加之网络等新媒体高度发达,使作为文字阅读的文学批评遭到前所未有的冷落。这样,从创作到批评的文本阅读,其数量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就是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与创作相比较,批评又是滞后的。有人指责和抱怨文学批评滞后于文学生产,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一般说来,总是创作在先,批评在后,没有创作,何来批评?而当今时代创作的飞速发展,以及新形式、新品种的涌现,将批评置于尴尬的境地。比如,过去每年只有十几部、几十部,至多上百部的长篇小说问世,而当下,每年就有几千部的长篇小说出版。面对每年上百部的电影、上千部的小说、上万集的电视剧,批评家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看完。于是就出现了不读作品或读不完作品的批评。再比如,网络文学由于取消了门槛,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令批评无处下手,显得无力为力。这也是文学批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从文学内部来说,作家不理睬批评,甚至对批评不屑一顾,批评的文字只在批评家之间、只在圈子里传来传去。这种自我言说式的批评,使其影响力难免减弱。

有人说,创作与批评就像两条铁轨,向一个方向延伸。这个比喻从方向上说是恰当的,从地位来说是理想的。创作和批评从来就不像两条铁轨那样平起平坐、长短对等,而是长短不齐,处在不对等的状态。批评家的状态,直接决定批评的处境。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批评家的艰难状态要远大于作家。作家可以通过一部作品或一篇作品出名或走红,批评家则不能。作家的创作可以靠想象、编织和虚构,每天可以写上几千字或者近万字,批评家则必须是有理有据,因此,任何一个批评家的批评文字要远远少于作家的创作文字,可见批评文章写作的艰难。批评家不是一个普通

的读者,而是一个有鉴赏力和感悟性的读者,还应该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思想者。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是披沙拣金。所以,批评家的知识、学识、思想普遍要求高。这样看来,我们对文学批评也应该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少一点责难和挖苦。

当下文学批评缺少什么

我们正确估价当下的文学批评,正视批评和批评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并不是为文学批评的缺失、缺陷寻找借口,也不意味着批评可以满足现状,停滞不前,而恰恰相反。“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因此,必须常抓不懈,必须不断改进,必须经常反思和自省。那么,当下文学批评到底缺少什么?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很多人从诚信、说真话、创新性、发现意识、问题意识、独立品格、多元观念、审美眼光、感悟能力等多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看来文学批评需要改进和增强的地方还真不少。这里,限于篇幅,只想补充或重申三点:

第一,价值判断的缺失,也就是标准的缺失。文艺批评有无价值标准?这似乎是不成问题但如今也都成了问题。今天,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我们该怎样理解和表述文艺批评的标准?标准要不要有?价值判断应不应该突出和强化?面对价值、价值理性、价值观的繁复、多元,再加上价值判断与标准的缺失,直接导致文艺创作和批评在价值方面的混乱,这一点,很多批评家都已看到并表示担忧。而人们所常说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其实就是一种价值标准。但有人却持价值中立和价值虚无的立场,或认为在当今多样化的时代,要建立具体统一的体系和标准非常困难;或认为没有必要急于认可一种统一的标准;或认为批评的标准存在于每个读者心中。衡量不同的文学,应该使用不同的标准。这些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也都值得商榷。在多样化的时代,更要有相对而大致统一的价值评估体系,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尺度的把握,否则,就是好坏不分,良莠难辨。这个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16)

散文集《我爱北京》:京味文学新收获

本报讯(记者 徐忠志) 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总是离不开他记忆中的故乡和给予他成长、生活、奋斗动力的亲朋挚友。对于北京作家周振华来说,故乡和亲情就是浓浓的枣花香、漫山摇曳的紫荆花、红灯笼般的柿子和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灿烂笑脸……近日,收录了周振华62篇乡情散文的《我爱北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部散文集京味十足,文风质朴,情感真

挚,写出了北京自然景观的神奇秀美,写出了北京民俗风情的古朴浓郁,写出了北京的深厚底蕴和精神气质,受到广泛关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士祥说,周振华具有奔放与真诚的写作情怀,他把对家乡的爱、对故土的爱、对祖国的爱,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带着深深的人文关怀,带着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质朴与真诚。他的创作就是一名乡

土作家自觉追求和践行“北京精神”的生动诠释。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周明说,周振华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散文家,他的作品用大地作底色,善于以小的事物作为叙述的切入点,细腻、贴切、淳朴、真实,没有高谈阔论,平静中带着张力、自然和诗意。他的语言无华,但情真意切,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我爱北京》以温暖的笔调描写了作家眼中北京的巨变和美好,是北京散文和京味文学的新收获。

作家诗人赴贵州习水采风

本报讯 闻名遐迩的习水,地处川黔渝结合部的枢纽地带,风光秀丽,气候宜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自然景观奇特、多样、神秘。这里也是一片红色的土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河,其中一、二、四渡就在习水境内。红军四渡赤水河留下的指挥部旧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住居,青杠坡战斗、梅溪河战斗等红军与川军、黔军殊死决战的战地遗址,红军书写的反蒋抗日标语等长征文化遗迹犹存,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近日,由程永新、陈耕、石一宁、龙冬、舒洁、顾建平、周占林、唐朝晖、方文、朱零等组成的当代作家诗人采风团来到黔西北,感受习水今天的发展变化。在从遵义去往习水的蜿蜒起伏的山路上,作家们看到了当地民众为克服恶劣自然生存条件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收获。在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作家们集体采访了公司董事长张德芹和总经理钟方达,详细了解企业“十二五”期间发展经营情况,并对这个享誉国内外、已有60年历史、销售业绩达30个亿的习酒厂的品牌建设及企业文化进行了认真考察。几天的采访采风,作家们对“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有了进一步认识,对既是革命老区又是美酒之乡的习水有了更加形象的了解。(稿件)

高陵文学现象研讨会在高陵举行

本报讯(记者 余义林) 日前,由陕西省作协、中共高陵县委、县政府主办的高陵文学现象研讨会在高陵举行。邓友梅、贾平凹、孟建国、朱佩君、刘斌、周明、雷涛、葛文政、肖云儒、李星、畅广元等出席。陕西70多个县市的作协主席及代表也参加了活动。

陕西高陵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一批“王老九”式的农民诗人和业余剧作者,形成以张诚、王杰、尚英为代表的作家群体。此后,高陵的基层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农民作家作品呈现出数量多、质量好的趋势,形成了令人关注的高陵文学现象。这次陕西作协授予高陵“陕西文学之乡”的称号,既是对高陵文学创作的鼓励和肯定,也是高陵文学事业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在下午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高陵文学现象”,并表示在高陵被命名为“文学之乡”的时候,更应在时代生活和民众情绪中,发掘新的文学资源,用激情和真诚来进行文学建设,表达老百姓内心的情感、信仰和民族意识。

本报讯 “80后”战士诗人胡松夏长诗《诗记雷锋》赠送仪式近日在湖南雷锋纪念馆举行,雷锋纪念馆馆长陈亮伟,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副会长钟长弓等出席赠书活动。胡松夏是目前全军现役战士中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协会员,近年来以创作反映主旋律的大题材作品而闻名军地。《诗记雷锋》是其继《绿色笔记》《金戈铁马》《共和国乐章》《铿锵之韵》《烈火青山》之后的又一部诗集,全书由“苦难的童年”、“走近燃烧的火炬”、“青春,被激情点燃”、“历史会永远铭记”四部分组成,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以诗歌的形式全面展现了雷锋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对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和赞颂。

据悉,这是湖南雷锋纪念馆第一次收藏军队现役战士创作的关于雷锋的文学作品。

西虹同志逝世

解放军报社副军职离休干部西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6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西虹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山城》、中篇小说《零下四十度》、短篇小说集《英雄的父亲》,以及散文集《我们的连队》《军中记事》《无尽的怀念》等。另有《西虹文集》(六卷)。

入藏雷锋纪念馆

诗记雷锋